

# 徐杰舜与汉民族研究

赵旭东 韦小鹏 主编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徐杰舜与汉民族研究

赵旭东 韦小鹏 主编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徐杰舜与汉民族研究 / 赵旭东, 韦小鹏主编.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222-11229-2

I. ①徐… II. ①赵… ②韦… III. ①汉族—民族历史—研究 IV. ①K28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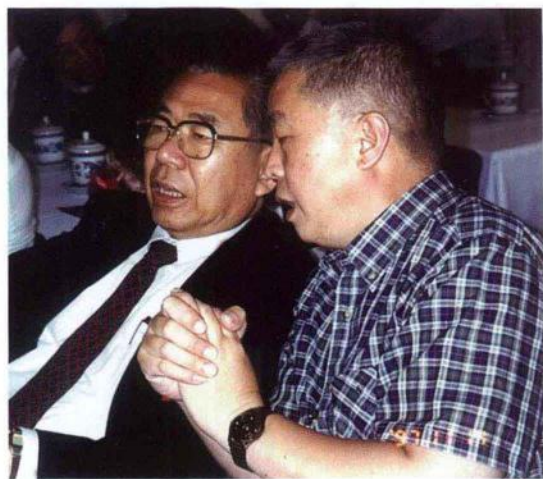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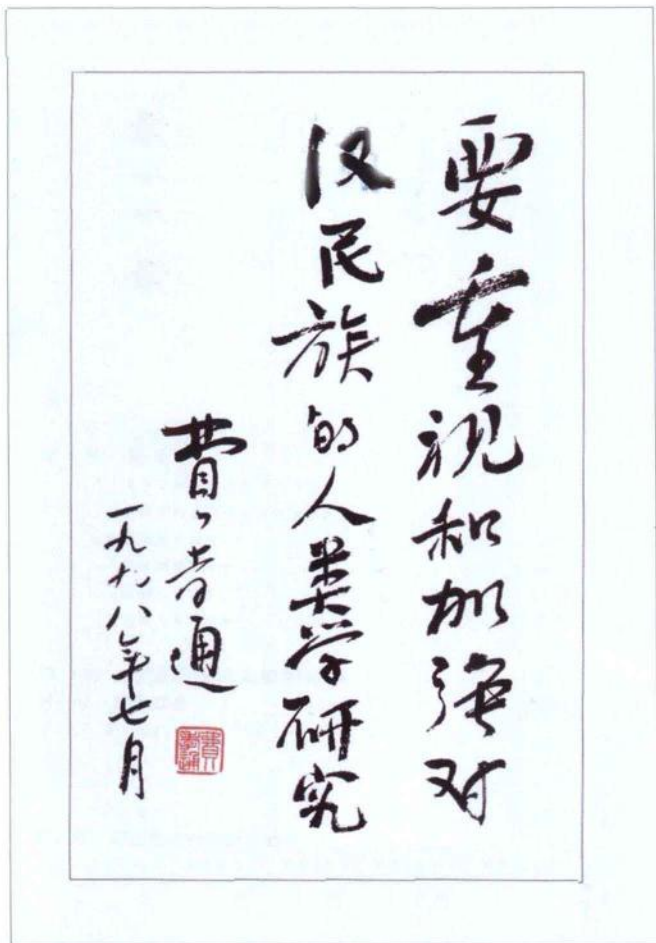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3765 号

责任编辑 文艺蓓 徐霞  
装帧设计 非鸟工作室  
责任校对 陈春梅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徐杰舜与汉民族研究
作 者	赵旭东 韦小鹏 主编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2.12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制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1229-2
定 价	3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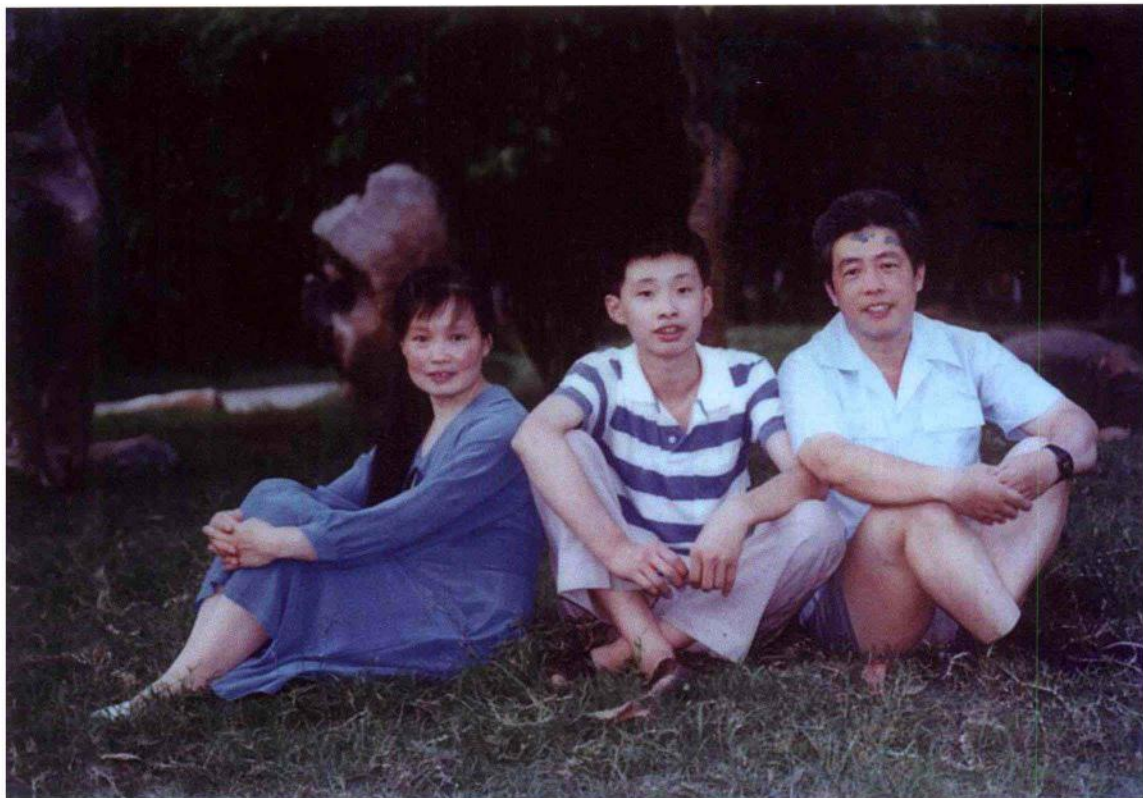
1998年7月费孝通为徐杰舜主编的《雪球》题词



1997年7月在厦门首届文学人类学研讨会上与李亦园先生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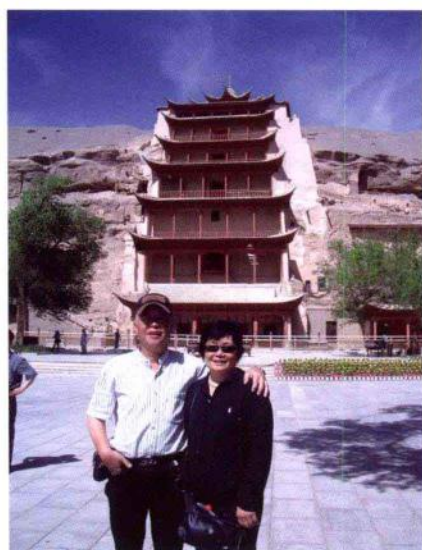
1996年1月在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讲习班上与费孝通先生合影



1985年4月，徐杰舜举家迁到南宁广西民族大学（摄于朝阳公园）



1987年在南宁广西民族学院宿舍的书房，在此开始了汉民族研究的相思湖征程



2008年6月考察敦煌





1996年广西民族大学汉民族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全体代表合影



广西民族大学汉民族研究中心成立时特约研究员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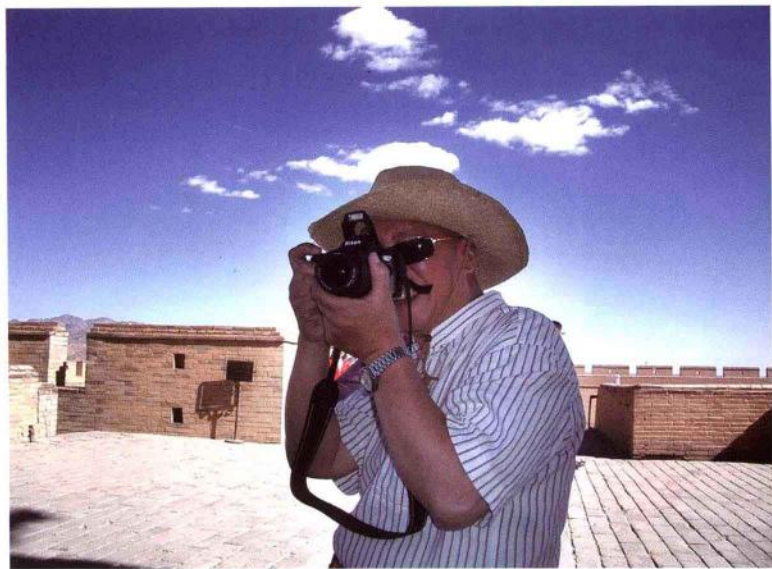
1996年12月24日，参加汉民族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代表们为时逢53岁生日的徐杰舜贺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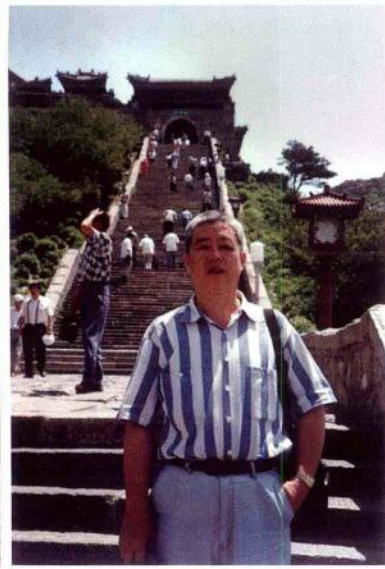
1999年10月在香港浸会大学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与哈佛大学傅高义交流时合影



根深叶茂——1997年考察厦门



2008年6月考察丝绸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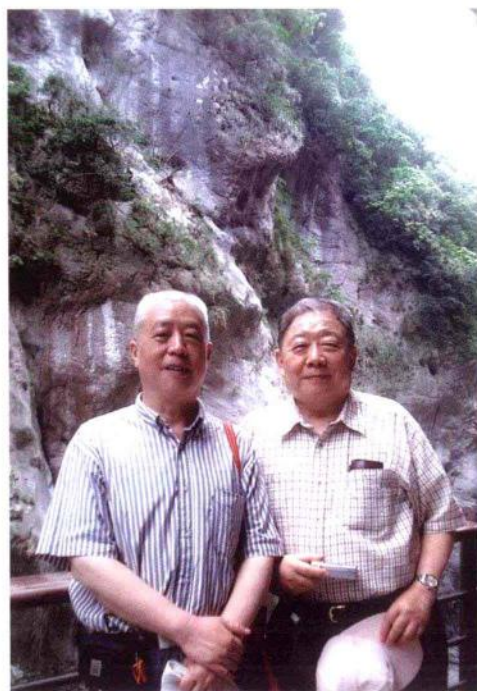


1996年考察汉民族的象征之一——泰山





1997年12月出席上海'97当代汉族学术研讨会的代表合影



2007年在台湾花莲泰鲁阁与乔健先生在一起



1997年12月与《雪球》责编上海人民出版社胡小静主持当代汉族学术研讨会





2011年10月考察赣州客家围屋



2012年11月在安顺考察屯堡人与傩雕传人秦发忠在天龙屯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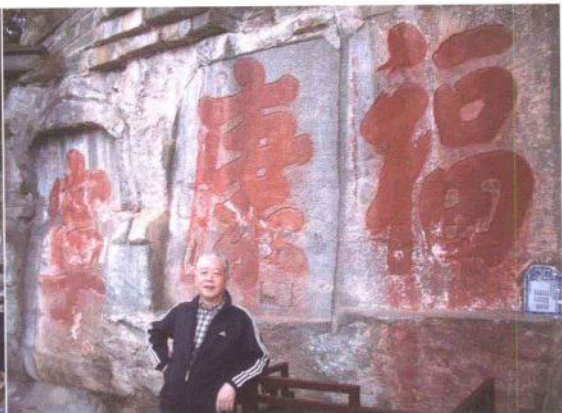
2000年10月拜访台湾民俗大师姜子匡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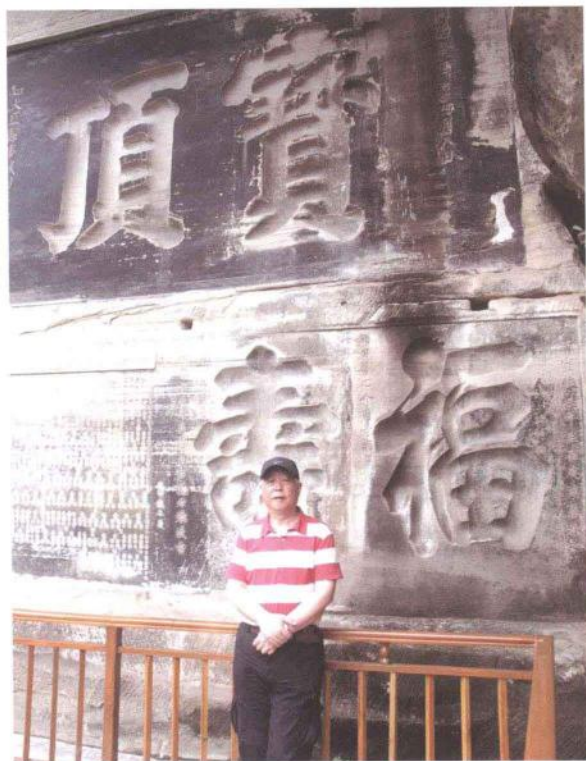
2000年3月与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会张兆和博士及师生参加西贡溪西洪圣古庙迎神



2004年考察平话人的土地诞



2008年10月在武当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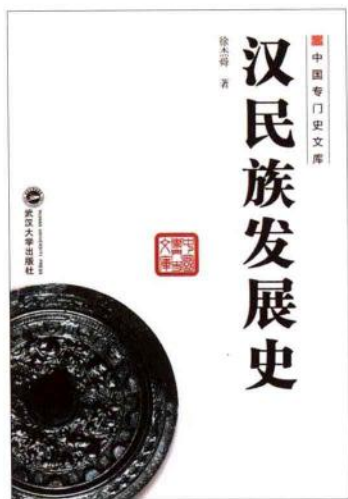


2012年6月考察大足石刻



2012年9月考察山西介修张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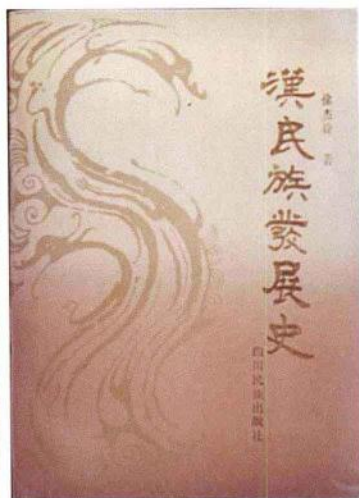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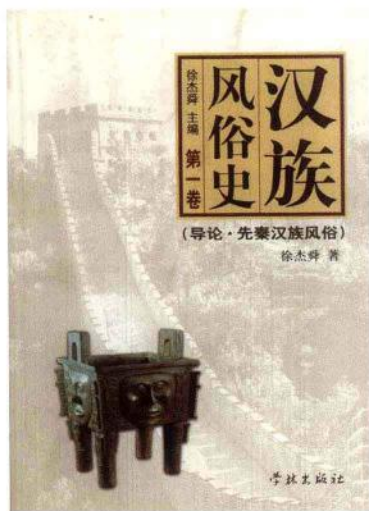
2012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将《汉民族发展史》收入中国专门史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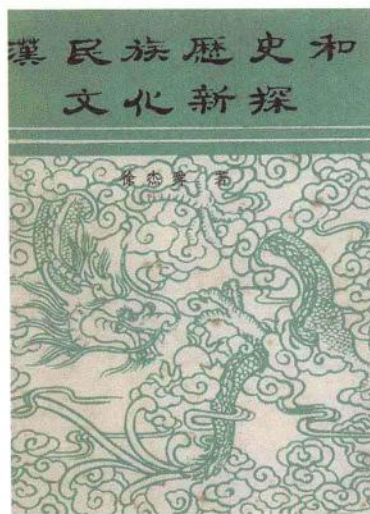
199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汉民族研究的扛鼎之作《雪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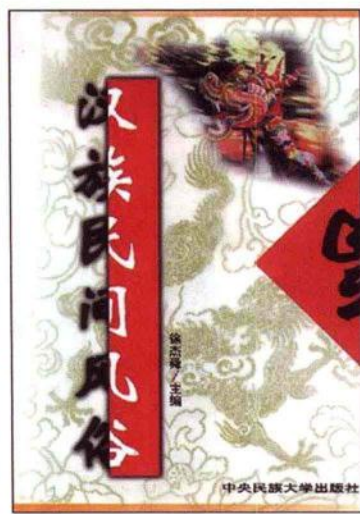
1992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汉民族研究的奠基之作



2004年学林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的《汉族风俗史》



1985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汉民族历史文化新探》，此书被《中国社会科学》评为汉民族研究的真正开始



1998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 序

徐先生杰舜教授，一位人类学家。这个行当中，到目前为止，他是靠民间力量办了十一届“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创立者。徐先生在年龄上算是我的长辈，在学问上则是我的良师益友。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徐先生十几年前在北大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极为活跃的身影以及他手中不断闪光的相机。尽管他并不以摄影家名于世，但很显然，他从不离手的相机，为人类学近十几年乃至二十几年的发展历程，留下了一批极为宝贵的影像资料，这些资料一定会随着年代的久远而更显珍贵。

当然，下文所述并非是要去评价徐先生在摄影方面的才能与贡献，而是要为徐先生为学几十年的人类学作品的评论集写上一个前言，以使视角不相同的散乱的篇章，可以借此有一个整体的呈现，成为一个完整的集子。

本来，无论如何我是没有资格去写这样一份带有荣耀性的文字的。实在是承蒙徐教授厚爱，专门打电话来，并一再叮嘱，敦请由我来撰成此文。由于碍不过徐先生这样的盛情，在看了他寄送来的前前后后几十人写的十几万字的评论文章之后，顿时便觉得，自己真的应该写一点什么。也许，所写文字不一定都和他著述的每一篇评论文字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却一定和徐先生自己长期的汉族研究有着直接的联系，因为我对这个论题向来暗有兴趣，并时时有所关注。这样想来，便找了一个相对空余的时间，手握久违的毛锥子，信马由缰地一直写了下来，然后再誊录到电脑里，修改之后，变成了此文。希望下面这些文字，于全书的编排会有一些补益，它不是具体的评论，而是一些观念的阐发。与此同时，更希望自己的随心所欲，不会有负于徐老先生向我发出邀请时所怀有的那份殷切的期待。

徐先生自己虽是历史系科班出身，却是以汉民族研究起家 and 见长的。他后来由此而将此一问题的研究不断地加以延伸，进而才会有其汉民族的“滚



雪球”理论的逐渐生成，这雪球一滚，便耗去了徐先生几十年的光阴。并且，据他当面对我讲，现在他一门心思都集中在一个项目的研究上，即有关于十卷本的汉民族通史的宏大的写作计划。据说，这十卷本中，每一卷的内容框架都已经在他的心中构建完成，前面的几卷也基本完成，有关出版社正在筹备出版事宜。

显而易见，在今日的世界中，对民族的研究，已焕然成为了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可以说，这方面的研究者之众，绝非仅局限于民族院校民族研究的那些专家们。但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也是极为明显的，那就是汉民族因其人口之众、历时之长，反倒无意中为民族院校专治民族学的研究者所忽视。可能在这些学者的心目中，中国的民族研究就只是少数民族的研究，这种偏见反过来又无端地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建构所一再强化，使汉民族这个超大集团完完全全地淹没在了庞大的少数民族研究的话语体系当中，汉族研究也就不能见其庐山真面目了。

但徐先生的研究却提供了一个例外，他多在民族院校从事研究和教学，以及编辑刊物的工作，但他的研究主题则是兼顾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研究的。而且，他的民族研究不仅是一种历史的方法，更为重要的还有，他悄然之间运用了把历史与实际的调查结合在一起的田野民族志的方法。他深入地研究了历史上的汉人、现实中的客家人以及新乡土中国意义上的中国汉人乡村社会的变迁。他由民俗学的资料搜集到民族学的历史考源，最后再到人类学的理论提升，无意之间完成了一个纯正的研究者学术成长的成长模式，那便是一种基于历史的文献，进而印证和质疑这些文献，从这印证和质疑中生长出有着文化解释意义的田野民族志的描述。

在今天的人类学中，显然可以清楚觉悟到的一个事实是，历史本身就像一个可以伸缩的长镜头，渐渐拉伸开来，才能使瞄准的景物看得更加清楚。而这个拉伸镜头的人，就汉民族研究而言，显而易见是那些在现代民族研究的框架之内勉力去探索汉民族自身成长历程的研究者。在这方面，费孝通先前曾经鞭指了一个方向，而徐先生肯定算得上一位借此而策马扬鞭之人。而且，这一路的风景，也都让他心领神会地一一记录了下来，并缀述成了一篇篇的研究成果，呈献给了人类学界。这一册评论集中所列出的那些书评式的评论文章，应该就是对这些先期成果的最为精要以及剖面图式的勾画，值得细细

品读。我的拙笔，无疑不需要再去对这些文字做画蛇添足的赘述。而我这里所能做的，而且也是最应该做的，就是对我自己所理解的汉民族研究给出一些必要的评论，借此以文会友，不仅求教于徐先生本人，也可问学于人类学民族研究的各位前辈和同道。

以“民族”来命名一个人群，这显而易见的与近代世界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有着一种紧密的关联。它让一个内部异质性远远强于其同质性的不同人群逐渐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语言因此也逐渐地趋于统一，同时人群中的生活方式，因为社会福利的改进以及均质化的社会服务，而变得趋于一致，并由此而获得了基本的生存与生活的保障，并同样在原有的中心与边缘的人群区分之内实现了其差异性的渐渐消除。而作为一个人群表征或代表意义的名称或命名，就成为了国家体系建构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民族即国家，而国家亦是民族。而法国专制君主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的狂言，至少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时代里，其存在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由此可知，民族国家一定是有意要把君主从其宝座上拉将下来的一种社会制度，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社会中，君主及其专制的制度，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真正存活下来的。

而在民族国家的体制之中，人民推举他们的代表来管理这个与他们一样有着共同族称的人民，以使得人民生活安定、领土不受外力侵扰以及基本的人权可以得到保障。显然，中国在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之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条民族国家的建设道路，并把原来分散开来、大多处于边缘的那些多受人为与自然环境侵扰而变动不居的少数人群，完全纳入到了整个“大中国”或“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体系中来。并从原来“华夷之辨”的思考模式，一转而成为现在民族多元共存的思考模式中来，并以此为基础而构建出一种以相互平等观念为基础的利益关系格局。而在这其中，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构成主体的汉民族，它由原来的“汉人”这个他称，一变而成为了中国 56 个民族之一的“汉民族”。但在这种转变里，谁都不会否认，之前借助汉语文献为媒介既已存在的汉人历史自身的价值，而且它本身还可以并且也确实被借用来作为后来所命名出来的汉民族的自身历史话语表述的基础。很显然，就这个历史的核心模式而言，它一定是与其本来就休戚相关、有来有往的少数民族的关系史密不可分的，并借助对这种关系史的梳理，汉民族



自身的历史也才能够得到一种准确的勾画。若是借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短语来概括此种关系，大概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如果承认有这样一种关系格局存在的话，那它核心的意义自然也就显露出来了，即它的构成并不存在一种固定性的结构，它的内容的变动性，反而体现了人群构成上的不确定性以及民族构成的确定性之间的一种固有存在着的结构性的矛盾关系。由此也才会有基于人群构成意义上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而有的并由徐教授后来发展出来的有关汉民族发展的雪球理论及其在隐喻意义上的真实准确而言。即它确实体现出了一种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的滚雪球的模式，且结果也必然是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而能够使雪片黏合在一起的介质又必然是一种得到大家认同的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一致性认同，当然更为直接的要素便是一种在价值观上认同的自我建构。这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去印证费孝通此前就民族关系问题而提出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经典理论，即徐先生由此而进一步阐释出来的从多元到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成长历程。

但所有这些理论，似乎也只是看到了民族问题研究的一个方面，而未曾顾及到其另外的一面。这另外的一面，在我看来可能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看到人群分化与解体的那一实际发生的过程，它构成了人群整合的对立面。借用传统的名与实之间关系的讨论，也可以说，如果民族是一个“名”的存在的话，这个“名”与它的“实”之间，从来都不是一对一匹配在一起的。在这个问题上，名与实的分离，反倒成为一种人群存在的常态。因此，以人群为基础所构成的民族的雪球，它就必然不是一个冻得僵化的雪球，它完全可能因为某种外部环境温度的改变，而出现融化与消解、冰冻与再融合这样的状态和过程。而且，从隐喻的意义上来说，雪球也不可能只是一种形态，它可以随着时间的转变而显现出五颜六色、多姿多彩的样貌来。如果对此问题，不能有这样一种全面的讨论，我们便无法真正去解读出费先生1988年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自身的微言所实际隐含的那另外一个层面的大义，即与“从多元到一体”相反的“从一体到多元”过程的真实存在。这既可以说是名与实之间的一种辩证法，亦可以说是民族问题研究的一种辩证法。

在此意义上，便可以将民族自身看成是一种有机体的存在，它自身有着

一种固定的，而且可能是先期赋予的名称或命名，同时也有属于他自己的不断成长变化的身体存在。我们显然不会因为知道一个人的名字，而辨别不出这是幼年期的他，还是成年或老年期的他；是病中呻吟的他，还是健康快乐的他。我们也当然不会因为他有多个形式的存在，而想不起代表他的整体性的名字究竟又是什么。

在此基础之上，再去思考民族史的研究，也许陡然会增加许多的新意。而在我看来，这新意之一便是，我们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去看待历史，即历史绝不是一种借长时记忆的片段去缀连出来一个完整和内部一致的历史表述，这样的一种所谓完整的记忆表述，过去不可能存在，当下同样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历史恰是这多样性的版本自身，在经由这种碎片化的审视中，后来的人学会去重新获得一种意义。而在此意义之上，我们必然又成为了一位历史的创造者，同时又是一些新的意义的阐释者，有所不同的仅仅在于，这种创造是一种以先期文本为基础的对它的再阐扬，并以此来使之最大可能地适应于当下的生活与现实。行文至此，忽然想起晚清大儒龚定庵，他曾述及九种古代人刻石纪事的社会场景，结果这些场景，每每都与国家大政相关（《龚定庵全集类编·说刻石》，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257页），而一些平常琐事，显然是无法真正在所谓历史的记忆中留存下来。有鉴于此，历史便只可能是依照书写者的需要而被记述下来的文字而已。

在这里，显然我们没有必要一直去纠缠于某种历史观念上的孰是孰非，这方面的讨论莫衷一是，极难有个定论可以成为大家的共识。但在我看来，也许有上述对于历史观念的这一理解就已经足够了。由此，我们对汉民族成长历程的考察，就不再是单一视角的，而自然会显露出一种多视角的关怀。而追溯这历史的进程，也一定不是单线的，而是多线的。相互既要有一种紧密的缠绕、交叉，当然也会有一种平行与对峙。我们绝对不能否认，人群成长的逻辑能够超出个体心理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这一基础之上，因此多元既可以滚雪球的方式使碎片融合为一体，也可以因一体自身的自由性的限制，而发生一种挣脱开来的裂变，以此来寻求一种新的生长空间及成长机制。这种一体与多元之间的辩证性的关系，更多应该和人群自身成长的情绪性机制而非理性的运思机制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此意义上，我们不仅要看到历史诸多记忆碎片所显露出来的一种可能有的理性的光辉，而且还要真正去留

心于其不可言说的那些情感表达及此类表达的一种多元性的存在必然。

毋庸置疑，徐先生的汉民族研究，使之成为这个领域研究的真正的开拓者。他似乎并没有像一些汉学研究者那样，左右逢源地在洋人面前非强调说自己是纯正的中国人；而一旦回到了中国的土地上，又会向着自己的同胞反复地显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喝过洋墨水的地道的洋人，因为他很清晰地以为，自己的思维似乎都变得像是洋人了。对此类两面性的作为，洋人们除了不知所措地表示一下微笑以外，余下的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表示呢？据说，大概是钱钟书先生说的，诺贝尔文学奖就是由这样的人评给西方世界以外的文学家的，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没评上奖的人，那才似乎是真的有点骨气和英雄气概呢。当然，我这里的英雄有特指，即是指那些真正为中国大众所普遍承认和有高度评价的大作家们。

应该说，任何学问都只可是本土的；但任何的知识，又都是在相互交流的实践之后，才会有真正茁壮的成长。对一个没有灵魂的研究者而言，拿一种现代时髦的知识，去套用到另外的一种知识体系之上，那套子不是太松了，就一定是太紧了，不大可能一上来就是很合适的。而对这种不合适的调整，只可能是要自己努力地去揣摩，并尝试着做些改变，而不可能拿一种现成的理论或方法上的工具去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人学术探索的历程，便是一个学术生命的真正体现和代表，它甚至不能完全由另外一个人通过学习式的模仿的方式而真正地延续下去。我们因此便要珍惜，特别是要去珍惜在一个人生命历程中努力去追求而积淀下来的那些知识的创造者，否则我们将不会有任何新的、成长的希望。

今年恰逢徐先生 70 大寿，他的学生们为他编订了一份年谱，还把对他既有著述散落在各处的评论都搜集在一起，编成一个集子，这显然也是对于他的人类学研究工作的一种同行的肯定。显然，他在人类学的汉民族研究之路上扎扎实实地走过了几十年的发展道路，这中间自然是历经了诸多的磨难，但也因此而有其不菲的收获。记得，先师费孝通教授在他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文章中，所引文献有限，但徐先生的著作却荣列其中，也可见徐先生汉民族人类学学术研究上的辛苦操劳着实有了一种在学术肯定性上的回报。

我去年年底，在给云南大学陈庆德教授 60 大寿的祝酒词里曾经写到“六十一甲子，七十才开始”这句话，尽管徐先生大约年长庆德老师十岁，